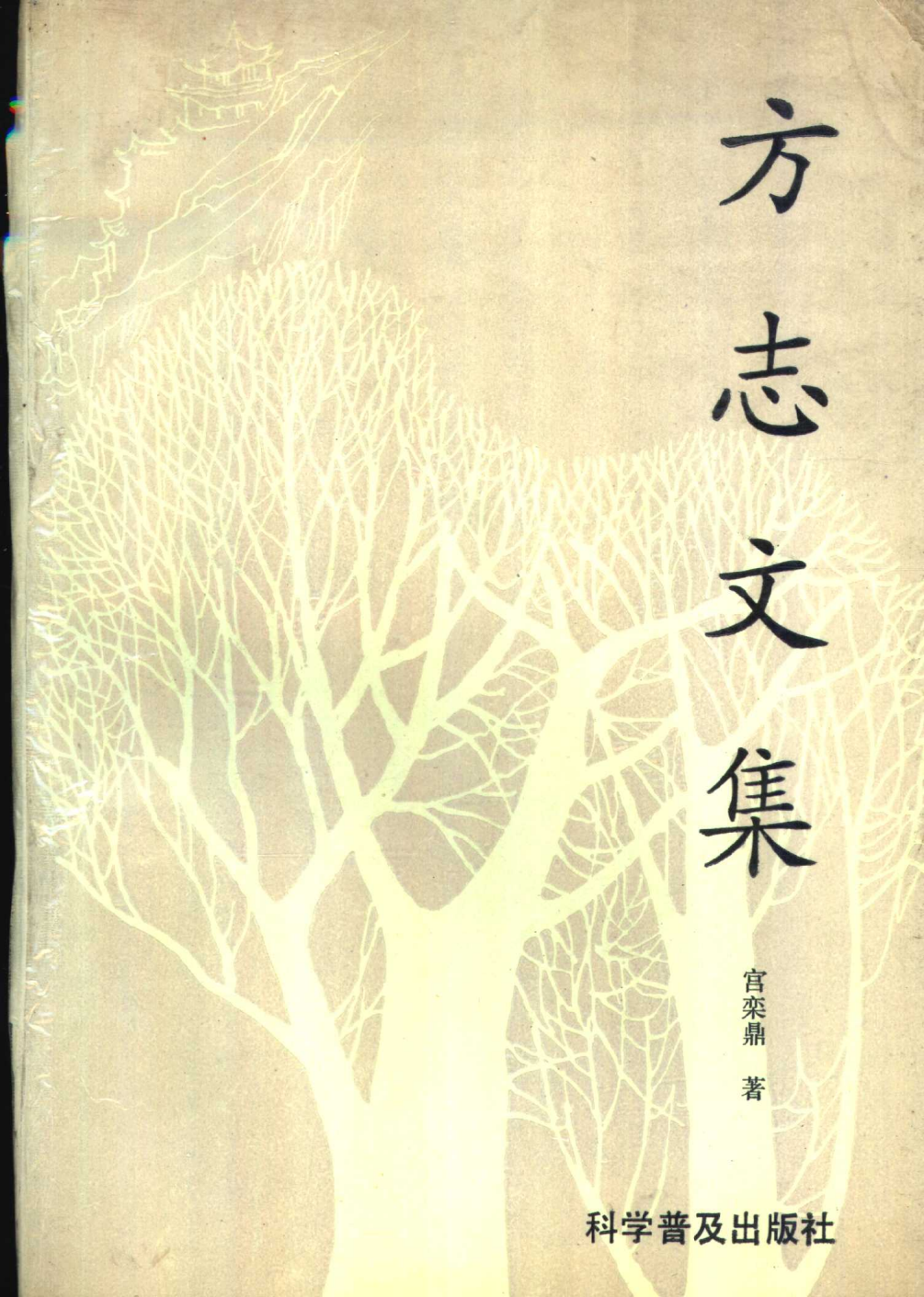




方志文集

宫栾鼎 著

科学普及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研究地方史志编纂工作的学术专著。它全面论述了方志的性质、作用和编纂方式,评辨了旧志的成绩和缺陷,探讨了编纂新志的难点和应遵循的原则,指明了编好新方志对两个文明建设的积极作用。全书22篇文章,被归纳为7个部分,其中旧志整理部分的《烟台地方志藏书目录》辑录了烟台市收藏的涉及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的志书300种,与《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的烟台部分相比,所藏方志版本达10倍以上,收藏数量多出了20倍,其中有10余种为罕见的孤本方志。

(京)新登字026号

方 志 文 集

宫栾鼎 著

责任编辑:朱桂兰

封面设计:王铁麟

*

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北京海淀区白石桥路3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发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12.25 字数: 275千字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 000册 定价: 7.00元

ISBN 7-110-02243-9/K·38

序

怀着极大兴趣和喜悦心情，读完了作者这部自选的《方志文集》。放下这厚厚的一摞文稿，不觉心情更加亢奋。

官栾鼎同志1982年开始从事修志工作。80年代的头几年，祖国大地到处都滚动着改革开放的春雷，同时商品经济的大潮也猛烈地冲击着每一个角落。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一度发生了令人忧虑的倾斜和畸变。事事向钱看，精神大滑坡，一时造成了思想领域的极度混乱。然而正是在这种时刻，清苦的修志事业选择了官栾鼎，官栾鼎也义无反顾地接受下事业对自己的挑选。从此，他心无旁骛，一头扑进茫茫史海，潜心求索。

就是在人们慨叹“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时候，他却坚持不懈地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这“精神原子弹”中汲取力量；就在社会科学遭人轻贱、鄙薄，好多人弃文经商时，他却孜孜不倦地研读旧志，博览古今名家志论，广集资料，“三更灯火五更鸣”，结合编志工作实践，不停地苦苦思考，笔耕不辍。正是靠了这种对事业的忠贞不二和执着追求，短短几年间，他陆续发表了二、三十万字的论文，数次获奖并被评为省、市方志系统的先进工作者。

收在这部集子中的文章，大多都已公开发表过。完全可以说，这是作者修志实践的经验总结，是辛勤思索、心血和汗水的结晶。从时间来看，早的写于1985年，晚的截止80年代末，前后相距不远；从内容来看，探讨方志性质、作用，论述方志宗旨、编纂方法，分析新志得失，评辨旧志是非，方方面面，涉及范围相当广泛。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看

到，作者文风朴实，立论严谨，每一篇文章内容都十分丰富。绝不似有些文章，下笔千言，不着边际，云遮雾罩，貌似高深，实则完全是脱离实际的夸夸其谈。因为作者身在修志的第一线，很多问题有动于衷，很多议论便属有感而发。有动于衷则能紧密联系实际，有感而发则入木三分。不仅如此，很多文章在尖锐地提出问题的同时，也把解决这一问题的钥匙交到读者手中。这就使文章既具理论深度，又具有较高的实践使用价值。

我们还可以看到，集中的文章，多具有一种江河奔腾、一泻千里，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势。这是与作者勤于思考、厚积薄发分不开的。对所议的问题，常是一针见血、一语破的，表现出独到的真知灼见。同时，“砭固弊常取类型，论时事不留面子”，对问题的不同观点，往往开门见山，直陈其言，针锋相对，旗帜鲜明，决没有一般旧时文人和世俗的虚言假套，矫揉造作。读这些文章，当事者获益，其他读者也深受启迪，尤其是方志工作者，会有一种促膝谈心，切磋琢磨的亲切感。有些文章篇幅虽长，读来也不觉费力。

我们还可以看到，集中的文章，许多篇初基甚大，立意高远。作者身在一隅，却视野开阔，思路广阔，不拘泥于一隅，为文往往立足全局，属意整个方志界。因此探讨研究带根本性的问题多，带倾向性的问题多，而不是一挑半剔，意浅调卑。从文章的内容很容易看出，它们分别反映出每个不同时期修志工作的主要矛盾和突出的问题，体现了那一阶段的鲜明特点，对于认识和掌握修志规律、防止失误、提高效率，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全书的品位如此，其价值不言自明。

有句名言：“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笔者

不揣浅陋，直陈管见，区区微意全在于：一、希望所介绍的一鳞半爪，能于广大读者全面了解此书有所裨益；二、希望栾鼎同志以此为新的起点，继续努力，在方志理论研究的大海中，涉深水，擒蛟龙。是为序。

赵修基

1991. 6. 6.

目 录

序

方志综论

方志综论	(1)
------------	-------

新方志编纂

新方志编纂议	(12)
方志的资料工作	(36)
论主编贵主	(59)
试论城市志的空间记述范围	(66)
对实行市管县体制的城市志编纂的几点设想	(73)
增强志书深度的几点看法	(85)

方志如何突出地方特点

方志如何把握地方特点	(92)
方志篇目如何突出地方特点	(103)
方志要在突出地方特点上下功夫	(116)
沿海开放城市志突出地方特点浅议	(129)

专志编写

从《烟台市卫生志》稿看行业志的编写	(143)
编写教育志要为经济建设服务	(166)

方志编纂方法

试论图表的作用及其在方志中的应用	(171)
浅议志书编纂中的比较法	(181)

志稿评议

- 浅评威海市志稿 (191)
- 评《牟平县志·建置隶属》 (213)
- 《建德县志·概述》反议 (223)
- 志稿评议作用浅议 (230)

旧方志整理

- 从烟台一隅看普查方志的必要性 (238)
- 几部稀见方志评介 (246)
- 烟台市地方志藏书目录 (276)

后记

方志综论

一、方志的定义

我国的方志历史悠久，大约在周朝就有了“方志”这一名称。《周礼》记载，外史掌“四方之志”，小史掌“邦国之志”，“掌道方志，以昭观事”。所谓“方”，即“四方”，所谓“志”，即“记”。记述四方之事，就是方志。即记述各诸侯国过去和当时情况的典籍，也可称作国别史。

后来，方志名称沿用下来。晋代左思的《三都赋》中有“方志所辨，中州所义”，“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北魏酈道元的《水经注》数次提到方志，其《渠水篇》载：“因其方志所述，就地缠络焉。”《后汉书·西域传》载：“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这足以说明，当时的一些学者，已注意对方志的研究和应用。

关于方志的定义，古今专家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同时代方志所载内容不同，其定义也有差别。《文选·三都赋》中张铄注释“方志”是“谓四方物土所记录者”。可见当时方志内容以地理、风物为主。宋代方志内容

广泛，因称之为“博物之书”。明代章学诚认定为“一方之全史”。后有地方“百科全书”之称。

目前，方志的定义有多种说法，兹摘录如下。

“地方志是以行政单位为范围进行分门别类的综合纪录”；是“一方古今览”；是“以地方为范围，以历史为体裁的百科全书”；是“以行政地区为主的历史”；是“地理学、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是“百科全书式的资料汇编”；是“兼具史地、注重人文、详今略古、纪实求真，包括天地人物的百科全书”；是“一地方、一区域比较可靠的文献，也是一地方、一区域的百科全书”；是“一个地方所辖行政区域范围内既载历史、又载现实，既叙自然又叙社会的一部包罗万象的真实纪录”；是“以行政区划为范围，记载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现状与历史的综合性、资料性著述”；是“以地命名、以地域为范围、分类记述该区域内一定时期事物的纪录”。

可见，人们对方志的认识不一，差别甚大。笔者认为，方志方志，一方之志，俗称“地方志”是也。可见首先在于地方。古往今来的方志又无一不是以行政区域为地域规范的，其内容又不外乎一地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因此，方志的定义可否作如此解释：“方志是以行政建置命名，以行政区域为空间范围的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综合性、资料性著述”。

二、方志的起源

我国古今历史学家和方志学家对方志的起源做过大量的考证和研究，但至今仍无定论。可以说是流派纷呈。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是认为源于《周官》（又称《周礼》）。宋司马光、元黄潜、清章学诚、清沈世枫等均持此说。司马光认为：

“周官有职方、土训、诵训之职，掌道四方九州之事物，以诏王知其利害。后世学者，为书以述地里，亦其遗法也”●，并进而认为，唐朝韦述撰的《两京记》及宋代宋敏求的《河南志》和《长安志》等侧重于记一地地理为主的地方志书均可溯源于《周官》。章学诚则从“史”的角度认定，方志起源于《周官》：“方志由来久矣……余考之于《周官》，而知古人之于史事，未尝不至纤析也。外史掌四方之志，是一国之全史也”。

二是《禹贡》说。《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该书假托夏禹治水以后，将全国分为九州，作为行政区划。并按州将所在地区的山岭、河流、薮泽、土壤、物产、田畴、贡赋、交通以及少数民族居住地作了简明系统的记述。是我国最早分地域记载各地地理、物产、贡赋等情况的专篇。因此历来为方志学家所重视，许多人进而认之为方志鼻祖。唐代贾耽、唐李吉甫、宋王存、元朱思本等属此流派。

三是导源于《山海经》说。《山海经》系先秦地理著作。全书分为18篇。内容主要为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留了不少远古神话传说。该书由《山经》、《海经》、《大荒经》三部分组成，作者不详。各篇著作年代无定论。近代学者多数认为不是出于一时一人之手。其中前14篇是战国时的作品，《海经》内四篇则为西汉初年的作品。古代方志叙述纂修缘起，大都提及《山海经》。

四是认为起源于《越绝书》、《吴越春秋》、《华阳国志》。这三部书已被近现代方志学家列为正式地方志书。《越绝书》原有25卷，现存15卷，不著撰人姓氏。记述吴越二国史地及子贡、伍子胥，范蠡、文种、计倪等人事迹，多

采传闻异说。《吴越春秋》为东汉赵晔撰，原有12卷，现存10卷，分为上下二篇。上篇即1~5卷记吴史事，下篇即6~10卷记越史事。《华阳国志》为东晋常璩撰。全书12卷，记述巴蜀史事。是四川省最早的省通志，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以“志”为名的方志。清洪亮吉认为：“一方之志，始于《越绝》。”范文澜认为：“东汉会稽郡人赵晔著《吴越春秋》，又有无名氏著《越绝书》，两书专记本地掌故，开方志先例”。但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认为此三书属地方史而非地方志。

五是源于地图说。《周礼·天官·小宰》：“听闾里以版图”，郑玄注：“版，户籍；图，地图也。”《周礼·地官·大司徒》：“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抚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郑玄注：“土地之图，若今司空郡国舆地图。”《尚书》、《诗经》、《管子》等书，也有关于地图的记载。近人王以中认为：“中国古来地志，多由地图演变而来。其先以图为主，说明为附；其后说明日增而图不加多，或图亡而仅存说明，遂多变为有说无图与以图为附庸之地志。”

六是多源说。即认为方志并非起自一源，而是多源，是从多方面吸取源泉而逐步发展演化而来的。

三、方志的发展

秦汉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方志发展的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郡国地志和全国性总志。秦代有类似后来方志的图籍。据《史记》载：刘邦的军队打到秦都咸阳后，“（肖）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刘邦“其知天下扼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者，以（肖）何得

秦图书也。”虽然这些图籍早已亡佚，但可推知是“一国之史”。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地图，可见汉代图籍之一斑。汉武帝时，“计书上于太史，郡国地志，国亦在焉。”《汉书地理志》为全国性总志，该志以西汉的103个郡国所属的1314个县邑、32个道、241个侯为纲，分别记述了户口、山川、水泽、水利设施、古今重要的聚落、关塞、名胜古迹及物产等。东汉应劭的《十三州记》、晋挚虞的《畿服经》和陈顾野王的《舆地志》等均属全国性总志之列。“地记”编纂繁盛，是这一时期的另一特点。陆澄、任昉两人收集到的汉魏以来的地记达240多种。图经的兴起始于东汉。“图”表示疆域、山川、土地等，“经”是对图所作的文字说明。迄今所知汉代最早的图经是《巴郡图经》。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记人的方志，如汉光武帝刘秀下令编撰《南阳风俗传》，以宣扬他的家乡。“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①。汉圉称的《陈留耆旧传》随之问世。此外，内容较全面的《越绝书》和《华阳国志》均成书于这一时期。

隋唐时期，显著特点是皇帝下诏修志。“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隋朝在统治的30多年中，曾编纂了数部全国性的区域图志。唐德宗建中元年（780），规定各州每三年一次编造图经送职方。后改五年。如有山河改易，要随时报送。这一时期方志的主要形式是图经。其中唐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最为有名。此外以“志”、“记”、“书”等命名的方志开始出现。如唐太宗第四个儿子魏王李泰的《括地志》、唐樊绰的《蛮书》、唐李璋的《太原事迹记》等。

两宋时期是我国方志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统

治阶级对方志更加重视，并编撰了全国性总志。宋初承袭唐代三年一造图经的制度。宋祥符三年，1566卷的《祥符州县图经》纂成。宋元丰年间纂成《元丰九域志》。宋徽宗还创置九域图志局，开创了国家设局修志的先例。这一时期的方志数量显著增加，仅现在所能掌握的即达600多种。而且在内容和体例上也有所创新。使方志趋于完备和成熟。较有影响的有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王象之的《舆地纪胜》、高似孙的《邦录》、范成大的《吴郡志》、周应和的《景定建康志》。这一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志”代替“图经”成为方志的主要形式。

元明时期方志种类增加，体例更加完备并基本定型。元代首创“一统志”。至元三十一年（1294）《大一统志》成书。成宗大德七年重修完成，定名《大元一统志》，计1300卷。明天顺年间，《大明一统志》成书。明代方志体例有所创新。除早有的平列分目体外，大多分志、目两级。元代于钦的《齐乘》和张铉的《至正金陵新志》及马泽修、袁桷、王厚孙纂的《延佑四明志》均为元代名志。明代康海的《武功县志》和韩邦靖的《朝邑县志》为简体方志。前者全书2万多字，后者仅6700余字。《武功县志》被后人誉为“简而有体”、“文简事赅”、“志乘之标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赞该书为“乡国之史，莫良于此。”对于《朝邑县志》，历来褒贬不一。明代著名方志还有谢肇淛的《滇略》、王鏊的《姑苏志》、祝允明的《兴宁志》等。

清朝时期对修志更加重视。《大清一统志》始修于康熙年间，共成书三次。初成于乾隆八年（1743），计342卷。二成于乾隆四十九年，凡424卷。三成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凡560卷。清代学者也十分重视修志。黄宗羲撰

《浙江通志》，顾炎武参修《邹平县志》，章学诚纂《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戴震、段玉裁、洪亮吉、李兆洛、缪荃孙、钱大昕等均编纂过志书。学者们在修志实践的同时，还从事方志理论的探讨和研究，建立起方志学。现存清代方志已达6000多种，占全国现存历代方志总数的80%。全国各省、府、州、县绝大多数都修有志书，有的还编修数次。不少村镇、乡里也编有志书。

民国时期政局和战乱影响了方志的发展。1917年，北洋军阀政府内务部的教育部通令各地编纂志书。1929年，国民政府内政部发布《修志事例概要》，要求各省建立通志馆。1934年，国民党政府内政部颁发《地方志书纂修办法》，规定省志30年一修，市县志15年一修。但因战乱，成书不多。有影响的方志有黄炎培的《川沙县志》、余绍宋的《龙游县志》、黎锦熙的《洛川县志》。一批方志理论著作问世，如李泰棻的《方志学》，傅振伦的《中国方志学通论》，王葆心的《方志学发微》等。

四、方志的种类

我国历代所修志书达8000多种，占现存全部古籍的1/10。按行政区划和记事范围来区分，主要有如下几类：一统志或区域志；省志（通志、总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都邑志、乡镇志、专志（边镇志、关志、卫所志）、土司志、盐井志、衙署志、书院志、乡土志，此外还有山志、水志、湖志、堤志，泉志、桥志、亭志、古迹志、寺志、观志、祠志、阁志、风俗志、时令志、金石志、物产志等。

从纪事年代上分，可以分为“通纪”和“断代”两类。“通纪”是指志书的纪事年代和内容贯通古今。“断代”是仿班固的《汉书》，只记述某一历史阶段的史事。一般说

来,一地首创的志书多为“通纪”体,后续志书,即“续志”,多为“断代”体。但也不尽相同。有的后续志书也是从第一部本地志书上限写起,贯通古今,即采用“通纪”体。

从志书的编者和志书的性质上区分,有“文人之书,有学人之书,有辞人之书,有说家之书”^③。

从撰写形式上分,可分为著述体和编纂体两种。著述体是由作者撰写,不旁征博引史料。编纂体是按照一定的体例要求,把材料分门别类地编纂起来,并注明材料出处。

从繁简程度上分,可分为一般志书和简体方志。一般县志多为几十万字,多者上百万字,而简体方志则仅有数万字,少者不足万字,如前文所述《朝邑县志》。

五、方志的性质

关于方志的性质,目前大致有五种不同说法。第一种认为是地理书,属于地理学科的范畴,这是章学诚以前的传统看法,《四库全书》即持此说。第二种认为是地方历史书,属于历史学的范畴。章学诚即持此观点。第三种认为方志是史地两性兼而有之,是“地志之历史化”,又是“历史之地志化”^④。实际是前二种看法的折衷。天津大学来新夏教授认为:志中有史,史中有志,史志不分,不必过细地考究它。第四种认为方志是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已自成体系,独具一格,形成了不同于地理和历史的独立的边缘学科。第五种是北京大学地理系于希贤先生认为方志是属于行政管理学的范畴。笔者认为,第四种观点较为妥当。这是由方志的特性所决定的。方志的特性大致有以下几点。

1. **地域性** 历来的方志只记载一个行政区域内的事,有特定的方位,有空间限制,且以行政区划名称命名。

2. **时代性** 方志以记当代事迹为主,要写出时代的特

色、时代的精华、时代的高峰。记历史也要写出各不同时期的时代特点。

3. 百科性 方志的内容雍容大雅，包罗万象，极其广泛，横及百科，堪称“百科全书”、“博物之书”。但它不是百科体，而是志体。

4. 连续性 方志以类系事，纵述始末，对事实的记述注意其变化，记出发生、发展的过程，以反映规律。另一方面，也指连续不断的编修传统。如常熟县仅清代就修志13次。

5. 资料性 方志以容纳大量资料为己任。但它不是原始资料汇编。志书对资料的编纂，讲究有事（史料）、有义（指导思想）、有文（文彩）。

6. 可靠性 这是对资料质量的要求，要保证资料的准确性、可靠性。只有准确无误的资料，才有“实用”价值。否则将贻害无穷。另外，方志多为当地人所写，重点又记当代，资料来源多依靠档案和社会调查。“时近则迹真，地近则易核”，具有真实性。

7. 思想性 这是方志的政治特点、政治标准。但多寓观点于记述之中，不直抒己见。

8. 科学性 新方志的内容讲求实事求是，不单要反映当代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的状况，还要显示出其未来发展的趋向；同时方志中图表的设计、编制，甚至资料的编排、储存都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另外，方志已发展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独立的学科，独成体系，其体例结构，讲求完整的科学体系。

9. 人民性 新方志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树碑立传，讴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贡献的英雄、烈士。

以上九个特点不是孤立的，而是高度统一的。统一落实

到资料上。前四点是在空间、时间、横、纵等方面表明志书资料的量的规定性；后五条是在科学性上表明志书资料质的规定性。总之，以上各点互相结合，高度统一，相辅相成，说明方志要求达到的高质量、高水平。

六、方志的作用

方志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显示了它的特殊的功能和作用，为封建统治阶级所重视。“秦人虽弃儒学，亦未尝弃图书，诚以为国之具，不可一日无也”^①。刘邦入关时，诸将争走金帛之府，惟肖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藏之，使刘邦具知天下扼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者，成为其夺取天下的指南。历代帝王重视方志的编纂，无不是出于巩固其统治的需要。“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成为封建士大夫重视方志的名言。封建统治者把方志看作是“资治之书”、“辅治之书”，通过方志了解地方的全面情况，以便有效地统治人民。唐代韩愈过岭南借阅韶州图经，阅后题诗一首：“曲江山水闻来久，恐不知名访信难，愿借图经将入界，亦逢佳处便开看。”宋朱熹诣南康军，下车首以郡志为问。

方志中保存了大量的有价值的资料，在封建社会就引起了有关学者的重视。清代著名史学家顾炎武曾参考1000多部方志，写成著名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外国人也十分重视我国方志的研究和利用。日本人撰著的《蒲寿庚考》、《中国万言汇录》等就是参考我国方志写成的。英国人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技史》广泛参考、引证了我国的地方志资料。建国后，我国广大科学工作者利用旧方志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国农业遗传研究室利用8000多种地方志所载资料，辑成《方志物产》400多册，《方志综合资料》120册。